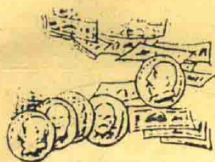


杭州往事谈

徐清祥 著



新华出版社

杭州往事谈

徐清祥 著

新华出版社

1994年12月

杭 州 往 事 谈

新华出版社出版 杭师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印张 5.5 字数 11.2 万
1994 年 12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2000

书号：ISBN7 - 5011 - 1857 - 4/K · 194 - 1

索古钓隐自有情

——为清祥作《杭州往事谈》代序

在不少专职文人都耐不住寂寞，纷纷作“下海”计的今天，在商海中闯荡经年，并颇有收获的清祥先生，却“上岸”窝居，潜心于《杭州往事谈》等书的著撰，不能不使人有“悖时”之想与“刮目”之看。

确实，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杭州的“旗下”，又有多少人对城隍山昔日的“香市”感兴趣呢？“唯其如此，更需要有人索古钓隐，把这些行将湮没的乡土史事辑录下来，就象南宋的《梦梁录》、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余》。供新杭州的建设者们作一个纵深的透视。”构想写作之初，清祥曾这样对我说。

无名可言，无利可图，清祥默默挑起了这付重担。于是，林和靖放鹤的孤山脚下，“杭州太守”三多寓居边的见仁里旁，郁达夫卧居的“风雨茅庐”侧畔等岑寂图书馆舍中，就经常多了一个瘦小但却精灵的身影。遍读杭州的方志、旧书、旧报，寻访对史事知情的杭垣老人，资料盈尺，数易其稿，清祥终于向读者奉上了心血的结晶——我们手头的这一本记述旧杭城风情的文史散文集。

清祥是杭州人，中学时代是在绍兴度过的。绍兴人喜欢

谈古，俚称“说大头天话”，绍兴的文人学士喜欢钩沉，周树人周作人兄弟都曾作过抄录碑帖的工作。可能是中学时代受了古绍遗风熏染的缘故吧，清祥对文史感兴趣，实在已有多年了。

我和清祥相识于二十年前西天目山的一次笔会上。那个时代，当然谈不上真正的文学创作，写的多是“斗私批修”型的题材，清祥却独辟蹊径，执意写与浙江乡土有关的青田石雕，散文《红宝石》发表后，反映不错，据说当时有人提议，以此文代替《青田石雕散记》，收入高中语文(二)的补充教材，这也间接证明了他对文史的兴趣。

此后二十年，大家各奔东西，我初学经济，后来改行搞新闻，自此与文学创作疏远，清祥商海沉浮，辗转干过不少行当，却始终未能忘情文史写作。清祥貌清癯，而精神矍铄，无论是做生意或是搞创作，常常出新点子，想完了以后，就奔逐不舍。他平素涉猎颇广，还获得过“多用扑克”的国家专利；前些年已出版过《苏东坡的故事》、《中国武林之谜》等文史著作，那天他请我作序，言谈中透露，还将撰写《中国棋话》，如果出版条件畅通，常久积压于心头的《气与人生》、《漫谈孝文化》等书也可能写出。作为一个老朋友，我衷心祝愿他一石三鸟，心想事成，年年有佳作问世。

赵力行

癸酉年立秋于杭州

《杭州往事谈》目录

索古钓隐自有情·····	(1)
杭州旗下营的兴衰·····	(1)
清末民初话禁烟·····	(3)
喜雨台棋人棋事·····	(6)
俱往矣，宗文义塾·····	(9)
功不可没的民信局·····	(12)
会馆的流变·····	(15)
杭州也有过租界·····	(18)
最后一垛城墙·····	(21)
钱江渡头话义渡·····	(24)
说杭“坊”·····	(27)
来去匆匆的人力车·····	(30)
杭州早期的星级饭店·····	(33)
杭州的旗人·····	(36)
错侃胡雪岩·····	(39)
杨乃武和“杭铁头”·····	(41)
章太炎的风骨·····	(44)
鞑二哥与踏二哥·····	(47)

起于花朝的香市·····	(50)
殡葬轰动杭州城·····	(53)
大世界浮沉录·····	(56)
收购旧书趣闻·····	(59)
似有神秘凤凰寺·····	(62)
早期的新光邮票会·····	(65)
新闻“自由”短命多·····	(68)
吴山庙会·····	(71)
六十年前的“敬老盛会”·····	(75)
杭州篮球话旧·····	(78)
你见过打擂台吗? ·····	(81)
酱园为啥都姓“官”·····	(84)
且说茶馆往事多·····	(87)
城站缘结马一浮·····	(90)
重提国货路·····	(92)
青年会的“青年时期”·····	(95)
钱塘江建桥“三奇”·····	(98)
说说西湖博览会·····	(101)
案例广告效应·····	(104)
祝融无情人有情·····	(106)
沧桑菜市桥·····	(109)
众怒难犯打米店·····	(112)
真真假假张小泉·····	(115)
盛夏话“杭扇”·····	(118)

禁用人造丝风波	(121)
奉帮裁缝进杭城	(124)
终点在柴垛桥	(127)
西湖妙用录	(139)
“死于名片”的汉奸市长	(133)
旧时的“荣誉市民”	(136)
往日之异闻	(139)
红门寻桃却见梅	(142)
三三医院和名医裘吉生	(145)
昔日打假两例	(148)
断碑难断西泠情	(151)
旧事杭城正月灯	(153)
轰然一声雷峰塔	(156)
女所长吞金	(159)
附录	
一个杭州人写杭州事	(1)
后记	(1)

杭州旗下营的兴衰

在老杭州的嘴里，还常能听到“营门口”、“旗下营里”这些词语，它虽指的是今延安路中段的四周，但也说明八旗军驻扎杭州三百年的历史及其影响。

清朝以前，杭州很少有满族人，更谈不上有旗营。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清军大举入关后攻下杭州。由于民族习惯的不同，特别对强迫剃发一事的不满，反抗者有之，逼死者亦有之，《湖上散记·薤发令》：“杭人赴横河桥死者，日数百人，河流为之壅。”为此，占领浙江的满族军队就在杭州划地盘、开军府、立满营、驻扎军队，因上有八色旗帜飘扬，杭州人称之为旗营或旗下营。

旗营占地1436亩余，它西旁西湖之东，介于钱塘门和涌金门之间，有“穿城十里”之称。曾任杭州知府的正白旗蒙人三多歌之为“五小营门九里城，穿城河水最澄清”，所谓五小营门，是指东北角的拱宸门，东之北的平海门，东之南的迎紫门，南边的延龄门及西北的承乾门。最澄清的河水是指浣纱河，即今日之浣纱路。

旗营建营之初，以武事最为突出，有驻军3910名。顺治八年，又遣官兵协防，十五年，再增甲兵五百副于营外，这是旗营兵力最多之时。为了保持八旗军力，在都统贝勒特洛的统领下，日日操练，弓、马、射轮番习之，“鼓角声残大

阵还，八旗兵马拥城弯”，写的是旗营的军威之势。道光三年（1826年），经朝廷核准，才有一月停操一日之准。

经过较长时间的建筑，后期的旗营内风光山水十分可观，“小桥流水，桃柳夹堤，鸡犬桑竹，别有天地，几如世外桃源。”使得一些偶入旗营的汉人“低回忘返”，晚清著名诗人林纾、王梦薇尝品出《柳营八题》；即：梅院探春，倚园消夏、西山残雪、南闸春淙、吴荡浴鹅、井亭放鸭、仓河泛月、花市迎彩。俞曲园在给杭州知府三多六桥著述的《柳营百咏》的评述中对八景更是啧啧称道。

旗营存续近三百年中，曾经过三度破立。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入杭州，驻防将军瑞昌，凭旗城以守，直等到江南大营张玉良派援军来救，太平军才退走，使困守的旗兵得以保全。咸丰十一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瑞昌战死，太平军攻下了杭州的外内两城，旗营成“太平营”。同治三年，淮军左宗棠克复杭州，将星散的旗营兵集合起来，仅四十余人；为了重整旗营，朝廷从乍浦、福州、德州、四川等地调入补充。辛亥革命兴起后，革命军攻打旗营城，协领贵林、佐领澄楚等固守，革命军“明日登关，驾炮城隍山轰之”，贵林、哈楚等战死，旗营被攻破。自此，建立近三百年的种族聚居地旗营终于在杭州地图上消失。

旗营瓦解后，八旗子弟及其家属，有的沦为乞丐，有的为修马路当杂工，旗下营成了一座空城。革命政府规划拆城墙，将旧营地统称为新市场。为了筹措费用，将营地分为四等，特等地每亩1500元，一等地每亩1000元，中等地每亩800元，三等地每亩500元。任人取择，公家将地价之款用来修建马路。就这样，旗下营在杭州的地图上消失。

清末民初说禁烟

鸦片，俗称乌烟，亦称土药，是外国奸商首先传进近代中国的一个怪物。鸦片传入中国后，人民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戕害，国民财富出现极大的流失，同时，也促使满清政府早日崩溃。当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浙江省督军和杭州县知事，就从禁种，禁运，禁售三方面，雷厉风行地实施禁烟。

晚清时，鸦片是公开买卖的，杭州的许多大街小巷里，有许多专供人吸毒的烟铺，兼售烟土的烟店以及少数加工制造“红丸”的“烟厂”，如花市路（仁和路）的“月宫”戒烟所，乌龙巷祖庙巷处的长生“烟厂”；民间拥有各种吸烟工具，如烟灯、烟枪、烟榻、烟丸、烟包等，则是花样繁多，五花八门。辛亥革命成功后，军政府代表了进步的生产力，顺应民意，首先对鸦片定了性：毒品。制订并颁布了《浙江肃清毒品条例》；还设置了禁烟委员（专员）；在民间还成立了“除毒协会”之类的组织，协助政府，开展除毒，实施严厉禁烟。由于军政府威信高，烟商和烟民不得不有所收敛，一时间，烟店纷纷关门，烟铺收起摊子，吸烟转入地下。但是，也有一些外商藉故进行抵制的，如《申报》1912年11月15日载：“拱宸桥俄商售卖烟店，今遵约关门。有二夫入内购烟，被巡警抓获后归案。俄领事函照都督府，请予释放，被朱都督严拒。”与禁售同步的是：查处。随着禁烟

运动的深入，一些假戒烟的及一些以戒烟名义营利者不断出现，如当时市上出现一种戒烟药，用药后效果不错，但不久发现烟民不吃这种戒烟药，仍会烟瘾发作，经过化验，这种红色小丸，内含鸦片，是假戒烟药。于是，省民政司公布了取缔“戒烟药”的政令，还对抓获的毒犯，处以极刑。

禁运是民初禁烟的第二个步骤。只是禁售，吸烟由公开转入地下，仍是麻烦。当时杭州的烟土来源有三：一是转辗来自沪上等地，从轮船、航船、划船等夹带而来。一是来自南方的省市，从车辆、包担中夹带而来。再一来自本省市。为了杜绝烟土的流入，都督府和杭州县知事下令，在车站、码头、城门、旅店、戏馆、茶楼等处，设卡盘查，对可疑的车、轿、船、箱、包、担、合，实施严查，《沪杭路近事汇记》：“二日由沪开杭的106号车，段长陈君，上车汇查，发现烟土一大包，计十六两，值1000多银元，但货主无人，难以抓获，只好将烟土交公结案。”《申报》1913年4月12日载：旗营内共和法政学校第七宿舍，有人聚赌，警官童光斗往拿，在某学员房中搜出烟具多副，烟膏十多罐，经查，系狱官彦乐天，推事王乃升之物，经报请审核，一并拿下治罪。杭警署三分署，在大东轮上查获私带之小包烟土十九包，系船伙邹迎春所运，魏警长照会日领事馆及日本警察高桥为雄，但日方借故延宕，后又交出一个不是邹迎春的“邹迎春”，审询情况，一无所知，而真正毒犯早以不知去向，可见当时外国人对我国禁烟的阻碍。随着禁运的深入，对禁烟者采取奖励举报的措施，将一些冒充军物，冒充军官的纷纷查出拿获。使禁运取得很大成效。

禁烟的最难一步，当推禁种。当时，杭州市内虽不产

烟，但郊县多有种植，尤以淳安的面积最大，就省内来说，金华、玉山、东阳、温州等地种植和查禁的任务多且艰难，查禁杭州的烟土就要和查禁本省其它的烟土同步进行。1912年年中时，禁烟委员对烟土情况基本已摸清，省府和杭县都下了严令，如1914年11月16日的《省府公报》：“严饬淳安……禁种鸦片。如违，严惩不贷。”但是，严令下去，迟迟未见反馈，究其原因，并非淳安等地不严禁，而是禁不了，当地农民为了个人利益，串同会党，反抗禁种，县知事和防营，兵少势单，既不够派去抓拿，也可能反被抓起来打死。淳安、东阳、玉山，山头天险，遍地罌花，迎风招展，种植达二、三十万亩。一月中旬，知事前去看禁，农民鸣锣为号，集众抗禁，马匹等用具，俱被抢去焚毁，知事只得易服逃回请兵。有一个乡的乡董知道查禁不力，自缚到县请罪，随来看热闹的农民有万人之数，声势汹汹，蔡前都督恐酿巨变，仅令罚款千元了事。为了打击抗禁者，浙杭均派出得力人员及武装军警协查，由陆军第六师师长张载阳统兵前往，并有撤换统领之权。

清末民初的禁烟，在军令如山的背景下，基本上扫除了吸烟和贩烟，彻底杜绝了种烟，其标志是：检查验收合格，禁烟有功人员受到奖励，禁烟委员一律撤消，《浙江百年大事记》：第一批受奖人员有前督办张载阳等一百五十二人。

“《申报》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载：“禁种之事，上年已肃清。”

但是，由于战乱不止，吸烟“死而复生”，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杭州禁烟又起了两次高潮。直到真正禁绝为止。

“喜雨台”棋人棋事

提起喜雨台，老杭州几乎人人知晓，特别是爱好象棋和围棋的一、二流棋手，更是津津乐道，或则终日流连，因为它曾经是杭州的棋文化中心，是培养和锻炼棋手的疆场。

喜雨台是旧杭州的一处最大茶楼，始始于一九一四年的朱瑞时期，系嵊县籍裘姓，俗呼三老板的所开，地址在今延安路的中段，即现小吕宋百货店和新会酒家的楼上。登楼的入口处，悬一横匾，上书“喜雨台”三字，并有“竺鸣涛民国三年题”字样。竺系浙军中的少将，后又担任过杭州警察局长等职。由他题名具有震慑流氓的作用。取名喜雨台，取苏东坡先生的名篇《喜雨亭记》的寓意，据说也是竺鸣涛的提议。

喜雨台创业初期，原来考虑以茶文化为本色，兼及棋艺的，这可从建筑格局看出。登楼的入口处，分为左右两厢，以两道屏风格开，左厢为棋室，除了茶桌茶椅茶具外，有一只三米见方的大象棋盘，供名手表演时，观赏品评之用，是杭城最早用的大棋盘。右厢为茶座，由于地理位置特佳，杭城的商贾很喜欢到这里来喝喝茶，品品味，汇集信息，交流思想，传递感情，乃至邀集会议。然而，随着时日的推进，左厢的棋人逐步扩展开来，并逐步占领之，至解放前后，已

成为杭州独具棋文化特色的茶楼。

登喜雨台下棋，得具有相当的棋力，臭棋是上不了喜雨台的，这和小茶居及民教馆内奕的娱乐棋不同，即使是化“学费”甘愿输“彩”的棋迷，一般也具有名手授一马（象棋）或授四子（围棋）的棋力。经常在这里出现的，早期有曾被南京万启有誉名为第一国手的张观云和杭城满族名手关春林，中期有以李友三为代表的“五虎一豹”，后期则有两次获得全国象棋季军被称为“刘仙人”的刘忆慈和后来任杭州体委围棋教练的张李源等。

喜雨台以“以棋会友”为特色。旧时，从未举行过全国性的棋赛，地区性的比赛也很少举行，名手间的交流常自发或个别进行。喜雨台建立后，著名象棋高手万启有、谢侠逊、林奕仙，围棋高手顾水如、张淡如等均曾登临献艺。省内或临近县的一些当地高手，也以到此奕棋为荣。有一次，一个自称诸几棋王的朱某人，满怀兴致，登喜雨台下棋，接战的是“五虎”中的李友三和冯阿青，一天下来，这位棋王被连拔十城，只得快快地离开喜雨台。

尽管喜雨台是杭城档次较高的茶楼，但由于棋类的决胜性质和旧时棋人们很少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喜雨台下棋总是“博彩”的，只不过彩金的多少，彩金分公出私出而已。一般以一壶茶资为起点，多者可达一二百元之数。由于这，一些经济拮据而棋艺较高的棋人，则赖此为生；一些棋品较高的人，则只是到喜雨台去转悠转悠，真正手痒时，就以低彩金为注，表示并不是为了钱，如后期的名手刘忆慈。喜雨台也盛行“公彩”之法，其缘由是“职业”名手之间，常不愿相互火并，以免万一坏了声誉。于是，就由各自拥簇的棋迷出

钱，分属两方，悬挂大棋，实行酣斗，胜者得另一方棋迷的全部彩金，负者则一无所得，还输了名声，而和棋则平分彩金。这种方式，由于棋迷参与，人数较多，彩金往往较大；而棋手们占着只可能赢钱，没有可能输钱的便宜；不过，棋手们也有一项义务，那就是对于奕棋过程中的关键棋或棋迷提出疑点的蒙胧棋，棋手必须当场讲解答复。带有一种传授技艺的性质。

解放后，喜雨台的棋事仍活跃了一段时间，但着“彩”则公开禁止，直到“一化三改造”时，茶楼转业，棋事无形停顿。至此，四十二度春秋的喜雨台，完成了历史使命，杭州的棋事由体委或社团的棋院、棋室替代。

俱往矣，宗文义塾

在旧时，有句“穷文富武”的话，意为：穷苦人尚可读书求出路，而练武艺非有钱不行。其实这话并不周全，一些孩子读不起书，不识一字，如何谈得上刻苦自学？正因为如此，历代以来，总有一些好心之人，兴办私塾，乃至兴办义塾。

旧杭城最著名的义学称“宗文义塾”，创办于清代嘉庆年间，起初设在定安巷内。后因士绅捐赠，有了塾产，就迁往“包衙前”，再后，因经过战乱，包衙前房产被毁，又请入了一处无主之房，而搬入皮市巷，直至以后改为中学。

宗文义塾的创办，可谓来之不易。清代嘉庆年间，嘉兴人周朴年携家来杭，立志创办义学，他先在定安路租下房子，打出宗文义塾的旗帜，并开始招收少量生员入学，由于周并非素封之家，对于应付义塾之租金，生员的伙食、塾师的束修等，均感到日益困难，只好采取日日外出募捐的办法。由于周既要关顾义塾的事务，又要为经费来源而奔波，煞费苦心，积劳成病。但为了义塾的支出，周顾不上治病抓药。这很感动了一些人，其时有个叫朱景恒的医生，了解周的苦心孤诣，以私蓄五百两相助，还为义塾劝募塾米：凡来他处诊病者，劝其将诊金改作帮助义塾之米。但是义塾的房租颇为可观，且生员与日俱增，更非小可。周仍以每天外